（上接第1版）同时，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工作的李伯钊、赵树理等，也几乎竭尽全力发表了即时应景的作品或文章。比如李伯钊的《群众文艺的创造》、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不能一笑了之或不屑一顾；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是主编们的职业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中，这里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来自解放区的李伯钊、赵树理，他们有丰富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第一次文代会后，延安文艺的经验已经放大到了全国，是惟一有合法性的文艺道路，“人民文艺”的经验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老舍虽然不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但是，他追随、认同延安文艺道路，也是诚恳地发自内心的。

从现实的层面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据有人回忆说，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情况，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创刊时曾做过“集稿人”，他回忆说：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赵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赵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画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后来林斤澜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时的汪曾祺，“冬日羊羔长袍长及脚面，小步踢踏，背微驼，一杯绿茶，一支纸烟。年方三十，不够遗老足够遗少。”1950年代汪曾祺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理论层面看，通俗文艺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通过通俗文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并且实现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初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重要的目的。1949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

但是，初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确实是一条风雨不平路。

从1950年9月创刊到1978年10月的《北京文艺》，因先后发表杨雨明、端木蕻良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以及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8年几度沉浮，几度停刊又复刊，走过了一条风雨不平路，发表的作品大多相貌平平乏善可陈。但偶尔也有好作品发表，比如《北京文艺》1956年11月号发表的浩然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还有两篇“名动天下”的文章：一篇是从维熙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一篇是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这两篇文章成为那个时代“引蛇出洞”的代表性事件。后来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北京文艺》二次创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比如1960年1月号连载了曲波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两篇》、1962年4月号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1962年10月号发表了郭小川的著名诗歌《甘蔗林——青纱帐》、1964年2月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首等。而影响最大、甚至改变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作品，是1961年第1期吴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1972年至1976年，刊物先后刊登了剧本《海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张天民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业》。这些作品是1970年代最重要作品的一部分。当然，这些作品具体内容和书写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电影文学剧本《创业》，是那一时期难得的好作品。但是，电影放映后，遭受到江青等人的批判并被打入冷宫，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创业》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主编们谨慎行事，努力追随时代的潮流，但是，大江大河波澜处，《北京文艺》无可避免地处在“漩涡”中心。如果从70年历史的角度看，这28年可以看作是《北京文学》的前史，它与初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大时代的文学重镇和风向标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1978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文联和全国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工作。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同志与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的讲话给文学艺术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一个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78年10月，李清泉调《北京文艺》任主要负责人。李清泉是江西萍乡人，中共党员。李清泉在《北京文学》的口碑，与他的资历和地位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有关系的是他的编辑眼光、胆识和担当。他上任伊始，就提出编发稿件要注重“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他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这个时期的《北京文学》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翘楚，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风筝飘带》、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等传诵一时。

《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发表了张洁的小说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气息，在时代交替之际如星光闪烁在天际。小说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是，张洁影响更大的作品是1979年第11期《北京文艺》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张洁以极大的勇气探寻并揭示了人在情感领域的隐痛，将那隐秘的角

落公诸于世，开启了对人的关怀诉诸于个人情感领域的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没有获奖，但它给张洁带来的声誉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来张洁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难忘的人和事。《北京文学》和我的关系，便属于这难忘之列，恐怕还要写进我的档案里。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这里发表的，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洁诚恳地谈到了李清泉主编。她曾经去找李清泉主编聊天：“他放下正在终审的稿件，耐心地听我语无伦次、头脚颠倒地讲我那已经写完或尚在酝酿中的故事，不时地与我辩论、讨论，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他曾写信给我，也曾当面向我提出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沉重的翅膀》最早的创作动机，也可以说是从这里来的。他是一个尊重艺术规律的编者，也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作为主编的李清泉的衡文眼光和正直人品可见一斑。

1980年第10期起，《北京文艺》改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受戒》一出文坛便引起震动，各种不同的议论充斥文坛。19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让文学界耳目一新。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如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当代小说接续了“京派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受戒》评价的犹豫不决，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受戒》。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

《受戒》的发表并非顺风顺水。李清泉后来回忆说：“我不仅面对着《受戒》，还面对着作者的一纸短简，其中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这话由作者说和由别人说，作用迥异。但我还是心地平静毫不犹豫地签发了。”每每读到这里，内心总会涌起极大的感动和激动。李清泉是著名编辑，著名的文学工作组织者，但他更是一个沐浴着现代霞光的知识分子。他的勇气、见识和胆量，今天看来竟恍如隔世。

与汪曾祺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是林斤澜先生。1981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发表林斤澜的《头像》，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之作。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那么，林斤澜的小说就是象征的。那时的青年新锐批评家黄子平说：“林斤澜是为现时代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贴近着现实生活，而且熔铸了与同时代人相通的真情实感。说到底，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不完全是由作家本人的主观体验决定的，仍然是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产物。对于真正的作家，新形式只能是新的生活内容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的艺术独特性是不容漠视的。”汪曾祺的《受戒》和林斤澜的《头像》这两篇小说的重要，就在于它在那个时代改变了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不同风格、不同写法的小说，都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北京文学》率先发表了这样的小说，开一代先河，功莫大焉。这样的文学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许多年之后，新老作家们对李清泉主编还是念念不忘。王蒙说：“李清泉同志任主编那段拨乱反正时期也是文学刊物的黄金时代，方之的《内奸》、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都是被其他刊物退稿，被《北京文学》发表，然后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的。”陈建功说：“在《北京文学》的发展史上，李清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总编辑，他的文学精神和主张，奠定了《北京文学》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名刊的风骨。它不趋风、不阿世，怀抱纯正的人文理想，关注着变幻的时代风云。既崇高，又朴实；既厚重，又灵动；既有一以贯之的操守，又有千姿百态的风格。”李清泉主编虽然只在《北京文学》工作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无论《北京文学》的同仁还是作家们，都对他感佩有加称赞不已。

一份文学刊物，某种意义上就是主编的刊物。1978年以后的《北京文学》，除了李清泉之外，谭谊、张志民、杨沫、王蒙、苏辛群、周雁如、林斤澜、李陀、陈世崇、浩然、傅用霖、章德宁、杨晓升等主要负责人前赴后继，是《北京文学》一直处于文学前沿的关键性人物。当然，无论谁任主编，衡定刊物的大小或影响力，无外乎发表了什么样的作品、团结了哪些作家、培养了哪些作家，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来的《北京文学》可以说占尽风光。从1978年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先后有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那五》，方之的《内奸》，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理由的《中年颂》，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林斤澜的《头像》，柯岩的《癌症不等于死亡》，陶正的《逍遥之乐》，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张洁的《条件尚未成熟》，邹志安的《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阿成的《年关六赋》，董保存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刘恒的《天知地知》，李鸣生的《中国863》，刘庆邦的《鞋》，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蒋韵的《心爱的树》等，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或鲁迅文学奖。获其他各种奖项的作品不计其数。没有获全国大奖但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如王蒙的《风筝飘带》，汪曾祺的《受戒》，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宗璞的《我是谁》，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余华的《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乔典运的《问天》，刘庆邦的《走窑汉》，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苏童的《桑园留念》，王小波的《万寿寺》，莫言的《枯河》，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单位》，谈歌的《天下荒年》等。这些作品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当代文坛，都意义深远重大。一个刊物能发表这样多的优秀作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林斤澜和李陀主持《北京文学》（1986年3月–1989年10月）的时候，《北京文学》经历了它的又一次发展高峰。林斤澜很开明，而李陀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他敏锐地接受和吸纳很多新观念、新思潮，而且他和青年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二人任正副主编，给杂志带来了新的气象。

1988年第2期的《北京文学》，发起了“伪现代派”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看作是1982年徐迟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以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史称“小风筝”的关于现代派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北京文学》刊发了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更深入、也更学术化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伪现代派”的说法最早是文学界私下交谈和座谈会上提出的，使用者以某种现代派作为参照，指责中国的现代派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派。黄子平从“伪现代派”的由来和所指谈起，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术语，“伪现代派”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概念，而是处于开放和急剧变动的文学过程中产生的，被许多“权力意愿”认为是顺手、便利的一个批评术语。20年之后的2008年，洪子诚非常赞赏地说：“这个缠绕不清的问题，经他在中西、古今等关系的层面上讲得这么清楚，也揭示了论争中问题的症结”。黄子平作品发表后，李陀在《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李陀强调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文学应该以‘现代小说’为建设目标……就我们中国现代小说来说，就是注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有益的技巧因素或美学因素。”这场关于“现代派小说”的争论，经过这次发酵，再次引起了新一轮讨论。1988年第6期《北京文学》发表了张首映的《“伪现代派”与“西体中用”驳议》，第8期发表了贺绍俊、潘凯雄的《关于“剥离”的“剥离”》等文章。这是《北京文学》在1980年代发起的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一次讨论。

后来，《北京文学》又陆续发起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大联展；推出“中国知青专号”，以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发表过“断裂”问卷和56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答卷，成为震动文坛和思想界的“断裂”事件。1999年4月16日，《北京文学》连同《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作协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这次诗歌研讨会后来被称为“盘峰诗会”，也被称为“盘峰论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即便是进入新世纪，《北京文学》依然保持办刊之外关注并参与文学公共话题探讨与引领的传统。2002年5月20至21日，《北京文学》编辑部与《北京日报》联合发起并举办“她世纪与当代女性写作研讨会”；2006年4月18至19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举办“文学与底层”研讨会；《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至第6期开展了“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的系列讨论。这些讨论，表明《北京文学》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话题，对文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作家和批评家及时地发表了看法。这是刊物能够一直站在文学前沿的重要条件。

说《北京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是指它的敏锐性和包容性。《受戒》是他们闻风而动势在必得的一个典型事例；80年代开始，《北京文学》未必是最先锋的文学刊物，但是《北京文学》是最早发现并发表余华作品的刊物。1984年，《北京文学》连续三期发表他的作品：短篇小说处女作《星星》发表于1984年第1期；短篇小说《竹女》发表于1984年第3期；短篇小说《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发表于1984年第4期。此后，余华的重要作品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等，先后发表在《北京文学》。后来余华在《回忆17年前》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北京文学》的交往，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998年夏天，魏微还是一个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某天一个朋友电话给她说《北京文学》正在找你。结果是章德宁在找魏微，要发魏微的一篇小说。魏微说，就为了一篇小说，他们找了我近半年的时间。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想，他们其实可以不发我的小说。那时候，我刚开始写小说，也不太有人知道我，完全是个新人。章德宁，是1976年就在《北京文学》工作的资深编辑，她责编的作家从王蒙到魏微到更年轻的作家，她一直做到《北京文学》杂志社的社长。其他作家像甘铁生、潘军、阿成、张辛欣、王小波、何申、谈歌、徐小斌、周梅森、徐坤、王芫、丁天、石一枫等，他们的成长，都与《北京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作家是刘恒。刘恒原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后来是北京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以短篇小说处女作《小石磨》从《北京文学》起步，以卓越的才华和勤奋的写作跃上文坛，并成为一位跨越多界的文学家。他1986年发表的小说《狗日的粮食》获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此后，陆续发表的《狼窝》《力气》《白涡》《虚证》《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中长篇小说，是当代小说的翘楚之作。一份刊物能够和这样多有影响力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份荣耀更值得骄傲？这些作家，就是《北京文学》最重要的资本。

新世纪的守正创新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动身南巡。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小平同志在他的暮年，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大潮同时也带来了文学期刊生存的困难。在新时期文学鼎盛时期，刊物发行量几十万并不罕见。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成如烟往事。有统计说，在全国的文学刊物中，发行量过万份的约10家，能够超过10万份的只有几家。报刊数量增多，电视日趋强势，互联网迅速发展，媒体多元时代的到来，使读者不断分流，发行量在萎缩，文学期刊开始面对市场化生存的严峻挑战。为了生存，《北京文学》也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改版转型，整容变身，投靠入伙，改弦更张”，这些举措背后都有一只隐形之手。1992年《北京文学》出版了一期《大纪实》增刊，这是刊物走向市场的一次探索和实践。1994年，《北京文学》创建董事会，后改称理事会，每年一届，一直到2002年，成为国内较早成立董事会的文学刊物。此后，举办了“京郊旅游杯”“企业之星”、九牧王杯、神华杯、新星杯等多个文学评奖活动。企业搭台，文学唱戏，跟老板握手、与企业联姻，这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真实景况。文学屈尊拉低身段，这在百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于是，“保持文学性，寻找生长点，这是文学期刊的庄严使命”的呼声再次响起。

办刊思路、栏目与内容的拓展与探索，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比如，1996年，《北京文学》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发表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在社会上引发一场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引起很大反响。

1997年，《北京文学》又推出国内首个文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评选对象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4种体裁，最初是每半年评选一次，2007年起改为每年一次并延续至今。此排行榜的宗旨是把一定时间段里全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精选荟萃，奉献给文学的忠实读者。这也是迄今国内创办最早、评选门类最多的惟一一个综合性文学排行榜。

（下转第6版）